

2 热点透析 Hot Dialysis

曾经家家房地产户户典当行 神木:满城尽是追债人



钱从地下到地上的循环

“2012年，我们的GDP就突破千亿元了，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经济体量相当于陕西省汉中市和安康市两个地级市的总和。”这个成绩一直是神木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高海雄的骄傲。

然而，优质、丰富的煤炭资源在给当地老百姓和地方政府累积了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将其带入了一个发展的“怪圈”：“财富”从地下被挖出，然后流入地下钱庄，再流进煤矿或楼市，形成了从地下到地上的循环。

“在神木这样的地方，人们突然之间有了钱，却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投资渠道。于是煤矿产业和房地产开发业就依靠着高额的利润吸引着巨额资金，很多人甚至借钱投资，民间借贷也随之兴起。”高海雄说，顶峰时期，县里的担保公司与投资公司数量接近1000家，一半以上家庭都存在地下借贷关系。“当地人60%的钱在煤田，40%的钱在房地产。”

2012年起，国内外煤炭市场低迷，煤价暴跌，神木煤矿产业链再也无法负担高额的借贷利率，资金链断裂，“跑路”事件频发，数以万计的散户面临着血本无归的窘境，辉煌一时的民间借贷已走在崩溃边缘。

“2013年神木全县GDP跌至925亿元，下降近百亿元；2014年上半年，全县GDP达464.7亿元，增速同比下降0.6%。”高海雄有些感慨。

而据神木县人民法院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年初至2014年6月，该院已经立案受理7200多起民间借贷案件，涉案总金额达57亿余元。

满城尽是追债人 讨债的也是欠债的

“都说神木‘家家房地产，户户典当行’，现在可不是这个光景喽。”在自家火锅店里，神木县的千万“富翁”王耀刚告诉记者。

在神木，他是个被街头巷尾的街坊们津津乐道的“名人”。“也不为别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欠了几千万元的外债。”

这个身量不高、言语随和的陕北汉子曾是县城中学的语文老师。“2005年，我开始四处借钱入股煤矿。当时煤价高，一吨能卖到800块钱，纯利润就有400多(元)。”王耀刚回忆道，“开个煤矿，一年就能挣几千万元，谁不眼红啊。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在借钱弄煤矿，我也就动心了。”

然而时运不济，从2005年到2010年，王耀刚3次投资煤矿、焦化厂，均因资金周转不灵而以失败告终，还欠下了几千万元的债。

“当时没有办法，只能再次选择买煤矿。只有这样来钱快，才能把债尽快还清。”2012年年初，王耀刚再次委托朋友高息借贷，买进一个不大的煤矿。“还好运气不错，当时煤价高，我也挣了不少，还清了一部分钱。”

不曾想，同年起，煤炭价格开始回落，王

耀刚忙将煤矿低价转手，用仅有的一笔转手费租下两家店面，做起了火锅生意。“也是为了让债主放心，我的店在这儿，人能跑到哪去。”王耀刚说。

问及两口子未来的打算，王耀刚掐断手中的烟，迷茫地搓了搓手指，“满城都是我的追债人，我哪里还有什么未来，走一步看一步吧”。

而王耀刚嘴里的这些追债人，大多数也有着和他一样的苦恼。

“他们是讨债的，同时也是欠债的。”神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喜林感叹道，煤炭市场繁荣时，当地几乎人人都拿出了所有积蓄，以近乎疯狂的高利率，将钱投入一片片煤田，希冀成为巨大利益中的一分子。“这样的借贷可以毫无约束，打个白条或者熟人介绍就能借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资金。然而一旦某个环节发展环境改变，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民间借贷链就会彻底断裂。”

“据说神木的民间借贷规模有200个亿，有人说不止200亿元。这个数据没有统计，也没法统计。”罗喜林说，因为除了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外，还有不少没有登记在册的地下钱庄和个人放款，“这个数额不是小数，也算不清楚。”

日前，神木县已成立化解民间融资风险和打击处置非法集资专项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处非办”)。据处非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处非办共接到非法集资案件报案线索245条，涉案金额79.4亿元，涉及报案群众7458人。已受理案件104起，经初查正式立案72起，涉案金额66.75亿元，涉及参与集资群众5752人，涉及犯罪嫌疑人181人，目前刑事拘留96人，执行逮捕72人，取保候审59人。

“这么大规模的借贷危机，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罗喜林说。

房价跌幅过半 不少楼盘烂尾

而神木的“借贷危机”，也不仅仅体现在煤矿产业。大范围的楼盘开发，让当地房价在2013年之前的多年里连续攀升。

在神木县城北约六公里的神木新村，11.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30余个楼盘，100多幢楼房沿南北通路绵延数公里，可容纳县城十万人。从2006年初建至今已有了8年，新村的施工仍然在路上。法治周末记者看到，多数建好的楼盘周围空无一人。

“楼盘开发受民间借贷危机的影响很大。”罗喜林说，“不少(房地产)开发商本身也

是‘煤老板’，煤价下跌后，资金跟不上，楼盘也就只能烂在这儿了。”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自2003年年底，神木房价开始升温，从均价890元/平方米，涨至2007年4000元/平方米。2010年以后，楼盘价格更是一路飙升，到2012年，均价已达2万元/平方米。

陈峰(化名)就曾在“富人炒矿，穷人炒房”的风潮带动下，拿出家里多年积攒的100余万元人民币，加入到炒房队伍中。

2011年，陈峰将投入百万元购买的两套在建房源，以300万元的高价脱手。膨胀的欲望促使他接连借款近800万元，继续投资房产。

2012年年底，他通过关系以1万元/平方米的均价购入6套新房。然而，2013年6月，小区的主体建筑刚刚建成，开发商却意外暴亡，其身后是数亿元的巨额债务，让楼盘开发至此画上句号，而包括陈峰在内的购房者们也成了烂尾楼的房东。

2013年，神木民间借贷市场崩盘，房价自去年中期严重下跌，这种态势持续至今。2014年起，当地楼市交易依然清淡。新城区一栋栋高楼空无一人，大量烂尾楼无线续建，开发商纷纷宣告破产。

有资料显示，在实际居住人口只有十几万的神木县，却有数百万平方米的房产在借贷危机之后成为空荡荡的“鬼城”空置房。

县城一家地产中介公司负责人说，“去年年初，新开的楼盘成交价还是能在原价之上再加个四五万元，今年就只有人问，没有人买，甚至赔本都没有人买。”

如何转“危”为“机”

“神木这样的明星城市，剥去光鲜的外衣，就会露出低端资源城市的本来面目。资金与人才的流失会使这些地方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介绍道，“但这并不是坏事，经过经济下行周期的刺激，资源型城市会逐渐认识到产业升级的重要。”

2014年起，经济转型确已成为神木的发展重心。

“神木的资源并非已枯竭，各类矿藏资源储量仍然巨大，潜力无限。”高海雄翻着手边的资料，不断解释道，“神木家底是很丰厚的，只是目前遇到了煤炭行业不景气这道‘坎儿’，一旦经济转暖煤炭行情回温，神木很快就会恢复原来的生气。”

相比高海雄的信心满满，倪鹏飞有些担

忧：“神木虽是百强县，经济总量大，但产业单一，经济水平也不高。除了有少量国企外，地方其他经济实体的实力仍然较弱，风险防控能力很差。”

倪鹏飞认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虽然迫在眉睫，但不能不切实际地与资源一刀两断。”最切合实际的做法便是做好资源延伸，即不断拓展、延长产业链条，进行科技创新，开拓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业。依靠煤炭，但不依赖煤炭。

高海雄也认同了这一观点：“煤炭深加工是未来神木煤炭产业的改革重点。‘北元模式’就是我们很好的探索。”

高海雄口中的“北元模式”，正是陕西省国企与民企“联姻”的典范。“北元公司是一个典型的煤炭深加工企业，业务范围从发电到水泥、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的生产，公司每年能够直接转化原煤400万吨。”高海雄介绍道，“去年之前，主打产品之一的聚氯乙烯，年产量只有10万吨，如今才过了一年多，这个数字已经翻了几番。”

转型瓶颈：资金、环境问题突出

虽然依托煤炭资源进行经济转型的思路已经明确，神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不可忽视。

“资金、资源、环境和技术的落后却始终是我们转型的瓶颈，会长制约神木的发展。”高海雄说，“如今神木人日夜担心的问题就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严重缺水和大面积采空塌陷。”

据榆林市政府统计，神木县已有10条河流断流，20多眼泉井干涸，县境缺水严重。

而神木县店塔镇红旗村就是神木县塌陷重灾区之一。这里曾因煤矿采空区塌陷引发山体滑坡，冲毁村头一座公路桥。“村后山坡被撕开一条条裂缝，最宽的超过一米，深不见底。”高海雄说。

同时，企业融资艰难，也让神木的经济转型举步维艰。

“无论是煤化油还是煤化电、煤化气，都是动辄上百亿元的改造项目，没有国企或外资企业的资金、技术支撑，神木当地的民营企业很难把项目做起来。”这是在高海雄心底盘旋了几年的难题。“银行贷款门槛太高，民企很难拿到钱，这也是为什么民间借贷会在神木火爆的原因。”

“转型这条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就是神木的现实。”说到这儿，高海雄叹了口气。

(张舒)

合作社贷款4600多万元。

2013年，国务院确定黑龙江省开展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此后黑龙江省下发了有关现代农业改革的总体实施方案，并于近日出台了农村金融服务推进方案，加快创新农村金融产品。

在黑龙江省产粮大县克山，土地规模经营面积达25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85%。“规模经营的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但也暴露出规模经营需要资金量大融资难的问题。”克山县副县长杨旭东说。

为此，克山县开展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试点，在全省率先启动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登记业务，通过土地流转平台，为广大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截至目前，克山县农村信用社、润生村镇银行2家金融机构共发放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3.1亿元，涉及农户1.2万户，抵押土地24.4万亩。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克山仁发农机合作社已经拿到了500万元贷款。”这家合作社的理事长李凤玉介绍。

记者从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了解到，目前黑龙江省各项金融保险改革已顺利启动。截至1季度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5371亿元，同比增长23%，创新金融产品贷款余额267亿元，增长30%。(管建涛 王建)

“重组+认证” 能否清理奶粉 “洋杂牌”

在刚刚闭幕的上海中国孕婴童展上，中外170多家奶粉生产和销售企业参展，与去年参展的180余家相比未见明显减少，反而有不少新面孔出现，其中大部分是“洋品牌”。

无论是工信部6月的《推动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还是认监委颁发洋奶粉“入场券”，都是为了高品质。杂牌“洋奶粉”会消失吗？整顿或难立竿见影，但奶粉品牌进一步集中是大趋势。

混乱的“洋杂牌”

对照国家质检总局最新公布的153家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进口商及产品相关信息不难发现，此次参展商中只有40余家在榜，而大部分展商也并不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82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企业名单中。

记者在现场看到，多家“洋奶粉”展商积极进行招商推广，或称澳洲奶源，或称新西兰原装进口，或称欧洲原产。来自广州的一家奶粉企业工作人员称，现在名单依然在不断更新，几百家公司在排队等候进入，公司进入名单是迟早的事，用不着担心。

同样不在名单里的另一家“洋奶粉”企业，一罐800克装奶粉的市场零售价高达398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有零售价高，批发价低，代理商才有更高的利润空间，才愿意代理。“给代理商的价格要看其销售规模，规模越大价格越低，不管怎样至少50%的利润是给他们的，最低供货价只有零售价的3折，让代理商赚钱，企业才能做大。”

据业内人士介绍，许多国外品牌在海外市场的价格不到130元人民币/罐，表明其成本不过百元，而这些产品在国内售价高达两三百元，甚至400多元。一些“洋品牌”故意将价格抬高，包装成高品质产品，实际上大部分费用都耗在流通环节。

乳业专家宋亮认为，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进口商及产品名单，也明确只有82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但缺乏强有力的执行部门，使得市场上未过关的一些杂牌企业仍在生产和销售，还有一些企业以超低价格将积压的库存清仓，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有奶源的“不用愁”

事实上，从生死大考的审查换证到鼓励兼并重组，都是希望提高行业的集中度，让“杂牌”最终减少直至消失。

“先是食药监通过发证提高行业门槛，再是工信部继续推动企业间整合。”宋亮认为，推动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有助于企业整合上游奶源资源，最终提高产品质量。

工信部的方案提出，力争到2015年，形成10家左右年销售收入超过20亿元的大型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集团，前10家国产品牌企业的行业集中度达到65%；到2018年，争取形成3到5家年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的大型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集团，前10家国产品牌企业的行业集中度超过80%。

其实2014年以来，乳业的重组新闻不断：光明乳业引入私募RRJ作为战略投资者，整合其上游牧场相关业务；达能拟以51.53亿港元认购蒙牛增发股份；合生元称收购长沙营可营养品有限公司100%股权；飞鹤乳业宣布全面收购吉林艾培特。

“市场择优、汰劣。”上海市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明是认为，得奶源者得天下，未通过换证审查不等于退场，其中一大部分奶源型企业还可以通过用“奶源”换“品牌、渠道、管理”的方式重新上场；拿到证也不等于高枕无忧，如果硬件、管理跟不上，产品质量没口碑，最终还会被市场淘汰。

严管不代表会涨价

严管并不意味着涨价，事实上各大品牌奶企正忙着促销。上海一家奶粉企业首席执行官称，今年是奶粉企业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杂牌奶粉大幅降价，迫使雅培、惠氏、多美滋等大牌也跟着促销，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价格总体下行趋势明显。

市场调查机构AC尼尔森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奶粉销售额仅增长4%，而销售吨数下降7%。而以前奶粉行业的销售额增长率接近20%。

宋亮认为，政策调整、产能过剩、电商渠道推动价格走低等因素，使我国奶粉市场的高价时代正在瓦解。奶粉产业将从高速发展步入平稳发展阶段，过去十年的高利润增长该回归正常了。国内婴幼儿奶粉行业清库存的行为至少将持续到年底，到明年这个时候，经过市场的大浪淘沙，杂牌奶粉有望得到控制和清除。

“婴幼儿奶粉不是涨价的问题，而是价格有下降的空间。”上海市一位监管人员认为，“降价是一个慢慢调整的过程，也是时间问题。”

宋亮认为，在产能供过于求、高于需求增长的背景下，奶粉的价格不会上涨，整体来说可能进入下行通道。

(魏宗凯 周琳)

经营权抵押 企业来担保 黑龙江给农村金融注入市场活力



曾担心没钱买农资，种不上地的黑龙江省桦川县星火燎原村农民高明镐，通过金融公司担保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一下子从银行贷了15万元。“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高明镐说。

为解决农民贷款难题，桦川县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鼓励农民将土地经营权转给金融服务公司，公司再将土地包回农民经